

伊犁河谷

(俄) B · B · 拉德罗夫著 佟玉泉译

1862年夏季考察路途日记片段

(1862年—译者注) 7月23日，我们离开了与中国边境最近的克帕尔和维尔内(阿拉木图)之间邮路驿站克克苏。驿站是个规模相当大的哥萨克村庄，位于卡拉塔拉河流入巴尔喀什湖的支流克克苏河岸边，东边是阿拉套山南支脉，其主峰便是中国和俄国的边界线。我们的行进路线是从克克苏驿站便能看到的东边雪峰。有人告诉我，这雪峰叫乌根塔什—石头堆，看来是由此处的卡尔梅克(指额鲁特—原注)人的鄂博而得名。道路基本是通过住有许多吉尔吉斯阿乌勒(指哈萨克阿乌勒—原注)的高原草地。大约行进10俄里后，我们爬上一座比较高的山，并在乌根塔什的吉尔吉斯人帐篷中住了下来。在这里，我雇用了一个曾在克克苏就向我推荐当翻译的名叫图泰的吉尔吉斯人。他曾多年生活在固尔扎(今伊宁市一下同)城，能讲北方、南方汉语和蒙古语，并且十分熟悉该地区的环境。我觉得，中国吉尔吉斯人至今仍未中断与中国的来往，既向我们也向他们效劳，对待俄罗斯政府就像是忠诚的臣民，对中方同样也如此。图泰甚至确切地告诉我，有不少阿乌勒人一年中有一半时间在中国领土上度过。

7月24日。今天很早就上路了。路越走坡越大，但始终向着东南方向，翻过乌根塔什山隘并未遇到多大困难。俄国境内的吉尔吉斯人居住区在叫库什木伦(“木伦”，疑为鼻子之误写—译者注)山峰(鸟嘴峰)就结束了，再往东，便开始了多石戈壁，这里草不多，偶见渠边长些树木，到处都是巉岩峭壁。很显然，要通过这一地区是有危险的。路上的危险一方面来自吉尔吉斯和卡尔梅克强盗，他们抢劫之后能够毫无顾忌地逃跑，并轻而易举地藏匿于荒无人烟的边境山岩中，因为我们不大的考察队由7个男子组成，其中3人备有良好武装，所以也无必要特别担心。但是，为了安全起见，我们不得不选择了通过阿尔腾鄂梅尔山隘和顺着伊犁河沿岸索伦居住区⁽¹⁾路线。从风景十分优美的克克苏河谷往东，直到库什木伦是单调的草原地带：大都是背景为高山的宽广平原和丘陵。这里到处都是大圆石和大石块，只是在北边才见到秃山岭，地势逐渐变成由博乐胡吉尔河泉水交叉的往南滑坡的高原。泉水流过的凹地往往比高原地面低20—30俄丈。这些凹地从高原上根本看不到，只是走到跟前才能看到谷底奔流的河水和长满灌木丛及高大杨树的河流。

很明显，河谷的这些地段是吉尔吉斯人极为理想的越冬地，所以一到冬季这里便布满了帐篷。博乐胡吉尔河床就是伊犁河谷中国地段的边界线。此处就有也称为博乐胡吉尔⁽²⁾的中国边境哨所，该哨所房屋由泥土和石块建造。哨兵只让我们向哨所走50步，然后一名带着弓箭和撒袋的中国士兵走了过来，并叫我们停下来。我叫一名哥萨克人和翻译把我的证件送过去后便准许我进入，但不准其余随行人员和驮马靠近哨所。哨所后面有几棵树和一座建筑物，据他们称，这是一座庙宇。哨所长官请我坐下，并命令人给我递过来一碗茶。他向我探问了我的姓名、此行目的、随行人员和驮马数目。经过一凡详细交谈之后，向一名士兵交给了两份通行证，并嘱咐我，不得擅自离开士兵，一路必须和他同行，不能有任何疏忽。哨所长官讲汉语，尽管如此，我并不需要什么翻译，因为围拢过来看热闹的十几二十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士兵都是索伦人—他们都能很流利地讲吉尔吉斯语。哨所长官是满族人，帽子上的铜标志说明他的职务为博什库⁽³⁾。大约等了一小时，用弓箭全副武装的护送我们的边防军士兵才来。他说话很生硬，走在队伍前面，和谁都不打腔。他只是时时回过头来看看我们是不是都跟着他走。我们快速步行，所以天黑之前我们便到达了流入博乐胡吉尔河的第三口泉水边，于是就在其谷底离吉尔吉斯人帐篷不远的地方过了夜。护兵把我们留在这里，自己顺着河流去离这里几百步远的边境看守所。这一夜在满是烟雾的帐篷中过得很快乐。半夜我被捕猎野猪的吵闹声所吵醒。看来这

里的野猪还不少。吉尔吉斯人从马上用棍棒打倒野猪后，并不动它，他们非常忌讳接触不净之物。一大早哨所士兵就把野猪带走了。

7月25日。一大早，另一新的护兵来替换了昨天的，他的武装与前者完全相同，他给人一种瘦弱不堪的感觉，那种让他这样的军人来保护我们安全的想法本身就显得好笑。他个儿矮小，大概60多岁。头上雪白的辫子⁽⁴⁾，脸色显得很憔悴，连脚都站不稳，步履维艰。他骑一匹三岁花马。这匹马跟骑手一样又瘦又小，而且他将一张崭新的大羊皮做垫子骑上，所以他只高出自己的马背几乎不到半英尺。我的哥萨克随从和其他吉尔吉斯人都随便而幽默，但是索伦兵严肃生硬地命令快给马备鞍，随他出发。我的护兵很快就照办了，因为我也急着赶程，中途未停，我们快速赶路，很快到了鄂杰克河边。鄂杰克河水流很急，也相当宽，雨后渡河基本上不可能，所以旅行家们往往等待好几天水位退落，才涉水渡河。在我们的渡河经历中，算是最困难的一次了。因为水涨到马鞍，过河得在鞍上盘腿而坐或跪着。因为水流湍急，尽管处在水流的45度角，也有将马冲走的感觉。过河时骑手们都大喊大叫，这一方面是吆喝坐骑，另一方面是给自己鼓气。我们的护兵落了一点队，等我们过完河时，他才到岸边，我们向他打招呼，让他骑好一点的马，但他觉得，这样可能有损于他的尊严，不理我们，便涉入河水里。我们所估计的立刻出现在眼前了：急流立刻把马冲走了，很快在不同的三个地方分别看到了骑手、坐骑和羊皮。我马上命两个吉尔吉斯人下水，他们都游向马和羊皮，而根本不顾号叫着的骑手。经我再三责令后，他们才游向落水者。我的翻译图泰毫不留情地抓住他的发辫拎起来从水中拖出，让他骑到其背后的马上。当我要求我的随从人员解释这一鲁莽行为时，他们说，要知道一匹马和羊皮要比这个小人值钱得多。完全湿透的小人站在我们面前时，显得非常可怜。我们的随员将士兵的裤子和衣服脱下来，把水挤掉挂在阳光底下晒，这时发现，我们的通行证都湿透了。我将这些湿透的证件交给翻译图泰。他把通行证摊在手上至晒干为止。等到所有皮靴、撒袋中的积水都倒净，我们又骑马往前赶路。不多久，所有证件都干了，但都粘到一起，我都不知道能否将其翻开。

离开鄂杰克河走数俄里后，土壤开始变肥沃，在我们面前开始出现黍或小麦的种植地。大部分庄稼已收割完毕，并堆成高大的草垛。我的护兵突然命令转弯，向南约走1俄里，便来到了地方长官丰得博什库（骁骑校）所在的帐篷。他请我们进了帐篷，见到了身着制服的长官。他打开一份通行证，看了看，并很傲慢地看了我们一眼，然后他突然用吉尔吉斯语骂了起来，骂我们到这里来干嘛，毫无疑问，他把我们当作妄图刺探伟大帝国一切的间谍。他的这种无礼行经使我们十分气愤，于是我便要求到离这里几俄里远的南边下一个哨所去，向当地长官控告他。我无法忍受这种待遇，让领事采取措施。然后，我就离开帐篷，骑上了马。这时丰得博什库（骁骑校）马上改变了说法，称这仅仅是开开玩笑而已，要我们应该在他这里喝杯茶。但我不再去理他，骑上马之后也命令随从们也上马，并缓缓上了路。我们的矮个儿护兵赶上来请求我原谅骁骑校，因为他不知道我是军官等等（我对这里索伦耕地的考察在此从略，其详情在下述索伦概述中见）。

自鄂杰克河向南急转弯后，我们的眼前出现了辽阔的伊犁河谷地。这里庄稼地不少，路上的大部分人手上都拿着麦杈和镰刀；男女都戴着平顶草帽，身着像是卡尔梅克人或汉族人的衣服；男的着短或长衫，而妇女都穿着普通的长衫。据图泰称，这些都是索伊鄂内人（这里是笔误，应为索伦人，而不是索伊鄂内人—图瓦人—原注），他们的耕地就在上边。南边远处像是雾云般的黑点，应该是索伊鄂内人居住的乡镇，而在平原上到处可见的较小黑点，是零星的庭院和庄园。这些庄园周围有他们专门种植的树木和果树。我们越往西挺进，碰到的耕地和用禾秸盖建的房屋就越多，而且到处可见草垛和干农活的人。

下午很晚我们才到达了位于霍尔果斯河谷的一个哨所。这个哨所建有两间小泥屋，其中的一间几乎半倒塌，既没有门也没有窗户。这些房屋旁边是四周用土墙围起来的不大的寺庙院子。在这里，我们没有找到人，我的护兵告诉我，这些房屋都空着没人住。于是我叫随从在任何一

间屋里给我准备睡铺，我们都住了下来，并且将锅灶也支了起来。因为随从告诉我们这里常有人偷马，所以将坐骑的前腿都给绊了，还派人夜里看守。等我们开始吃饭时，中国士兵才照面。他向我们表示谦意，说这里的驻兵正忙于田间劳动，只有他一人留在哨所值勤，并将护送我们到下一个哨所，同时告知最好不要经过霍尔果斯城。但图泰表示不同意，并且坚持一定要经过霍尔果斯。后来该士兵向我解释其原由说，一般偏离大路而行总会有危险，尤其像霍尔果斯更如此，而且，到霍尔果斯还要绕大弯。这一站的索伦兵比前一哨所的士兵友好得多。当我问到图泰这些士兵变友好的缘由时，他说，自从我们训斥骁骑校以后，都不敢对我有所不敬了。这个士兵已向图泰打听过我是不是安班⁽⁵⁾一将军，图泰告诉他就是安班。我们的老护送也对我们变得很客气友好了，我便请他和我们一起共进晚餐，并送给一些小礼品，对此，他以无数次鞠躬表示感谢。

7月26日。早6时左右，我们离开了哨所，并通过了霍尔果斯河谷地。霍尔果斯河只低于草原地面几英尺，但很宽广，因为霍尔果斯河几乎分为几十条支流，所以都是浅水流。大大小小的卵石填满整个河道，可以看出，春天河水涨满时，是很难通过的。大约行程5俄里，我们便到了霍尔果斯城。这时，不难发现我们已进入城市范围。首先，常常出现在眼前的是庄稼地以及用土墙围起来将其分隔开的独院独户、小林场和果园，接着开始看到做工的人和行人。我们慢慢来到两边用高大的土墙垒起来的窄道，这里行人不多。这条窄道到头急转弯后看到的便是高大的树木。沿着狭窄通道再走50来步，在眼前出现了神棍一挥后的景象：我们突然来到了一条相当宽的挤满人的商业街。街道两边布满了店铺和作坊，所有裁缝、鞋匠、铁匠和木匠几乎都在露天工作，在他们之间又布满了摆有各种各样食品、碗盆及木制品的店铺，到处可见用汉字书写的巨大招牌。这里也有饭馆。这些饭馆都用大鱼代替招牌，所以远远便能认出。

商业街中间稍稍高出的部分是，两轮大车（阿尔巴）、小推车还有坐骑以及驮畜要通过的道路。各路小商贩将自己的商品摊在货担上挑着，满街大声叫卖，以招来顾客，时时可见穿着褴褛的乞丐、发型美丽并插着花朵的妇女和戴着宽大太阳镜、打着遮阳伞的游人，擦肩而过的不少是卡尔梅克人、鞑靼人以及吉尔吉斯人。简而言之，已经习惯了单调草原景色的双眼，对如此显眼夺目、五彩缤纷的场景可以说是目不暇接了。说实话，这场面我虽然很陌生，但感到好像在自己家乡。四周的欢快气氛和紧张的劳动场面，虽然总的情调有点陌生，但给我们一种似乎来到了欧洲某一城市的感觉。经过草原空旷单调而又漫长的路程之后，我有了一种重新走入文明生活的感觉。文明，人类只有在其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失去过这种生活时，人才会真正珍视它。我们这支小小的队伍，吸引了众多的围观者，使我们处在进退两难的困境中。我四处寻找失踪的护送，结果他走出队伍跟哈萨克人说话去了。当图泰发现我们遇到了麻烦，赶尽跑来驱散围观的群众，边挥舞皮鞭边大声喊叫：“俄罗斯安班！”这种积极干预很快把我们解救了出来。围观的群众虽然大声叫喊着、谩骂着，但还是给我们让出了一条路。可以看出，虽然有一点汉语语调但意思完全明白的强有力的一句俄语，对此产生了作用。在此前，图泰就曾提醒我们，在中国城镇要提防小偷，所以我下令大家集体行动，这种提醒很快就被证实了：天朝帝国的一个盗贼试图偷走夹在马鞍上我的一件大衣。当我发现时，他已经解开了两个扎带。我也学图泰的有效方法，不声不响地用鞭子抽打这个无赖的脊背。他吓得跳到一边，叫喊着解释说，他只不过是想把我的衣服捆得更结实一点。与此同时，他急忙挤进人流中，再没有表示其他反抗。到达固尔扎城之前，我们不准备停留，所以决定就在霍尔果斯吃饭，并叫图泰找一个说得过去的旅馆。图泰叫开了一个相当讲究的旅店大门，侍卫接走了我们的坐骑。一个中国人把我们让进客房，并给我们送来了茶、馍馍、甜饼，后来还送来了一罐子啤酒。之后又上了油炸鸡和辣汁焖肉丁。这里的饭菜做得很讲究，而且一切都很干净。上的是烈性热酒，并且用的是小酒杯。用餐使用的是象牙筷子，所以我也没有少受罪。我们在这里还喂了马，我的随从们也吃饱了肚子。我为所有饮食总共付了2卢布45戈比，主人收下了俄国钱币。图泰告诉我似乎收多了一点。接着图泰开始催着上路，因为前面还有很长的一段路，又要换护送，而且换护送一

般都要耽误一些时间。于是我们都走到院中，跨上马和不断向我们鞠躬的客栈侍役告别，走进了挤满人群的大街。不久，我们便进了一条胡同，因为这样绕道行进要比直接通过闹市区要好得多。给我的印象是，当地人对外来人态度相当不友好。我很少找到谁的脸上不带着恶意，也许是敌对或者是鄙视的表情。这当然不是指的那些有实业、利益关系的主人。我认为群众中的这种敌意是政府人为造成的。他们将人民与外界隔开，因此他们对一切少见的东西均采取小心提防的态度。

等我们离开城区之后，我们的护送才来。他告诉我们，一开始不敢来是因为害怕自己的霍尔果斯债主。他说尽管他也是在服役，但他们也会毫不留情地将他抓起来。那么他将如何向自己的上司汇报呢？我之所以提到这些，是想说明中国的商人是多么小看军人的。听说，他们对下级官僚也很不尊重。

从霍尔果斯出发，我们一路见到连绵不断的园林、庄稼、村庄和院落。这里的道路非常糟糕，很拥挤，行人、挑夫、驮驴、大车（阿尔巴）和骆驼队始终来往不断，到处可见人工造的树林。我们所经过的旅店，都住满了人，路上行走的官员、骑士、士兵没有一个理睬我们，儿童们要么叫喊着逃跑，要么停下来朝我们说些不友好的话。在这里，到处充满了热闹和欢乐，庄稼也都种植得很好，果园大都种植的是苹果、杏和桃树，而且树上都挂满了果实。这里的庭院大小不一：有些甚至一眼能看出它们的主人有多么富有；有时也碰到图泰告诉的那种“赤贫”得完全裸露的穷人。这时我已经熟悉当地居民的服饰特点了，并且完全可以区分汉族商人和索伦兵了。大多数汉族妇女，其中包括中等水平的农妇都是小脚。她们的头发梳理得十分光滑整齐，尽管穿戴很破烂，但头上都插着花。

傍晚，我们到了一个相当大的村庄。这就是 TARJI，中国人称其为塔勒奇。塔勒奇前面是住有旗兵的哨所。在这里，没有耽误我们多少时间就给替换了护送。这个护送穿着与索伦兵一样的服装。

离固尔扎城还有数里路的时候，我们从两边都有庭院的大路踏进了基本是沙土的伊犁河岸边。这里杂草长得很高。我们天黑时抵达了固尔扎城。后来我们就直接去了郊外的俄国洋行。

伊犁河谷的居民

我简要叙述过伊犁河谷的地理情况，现在就开始讲述这里的居民。过去的历史和中国的统治当局将各个不同的民族集聚到了这块不大的疆域。这些民族各自的来源不同，语言不同，他们各有不同的宗教信仰、生活习俗以及管制法。一个多世纪以来，他们彼此背靠背地一起生活，有时甚至混杂着一起住，但没有相互融合，情感上也没有接近。这种各部落之间的相互敌视正是满族统治的依托。各个部落比起同样也受到满族统治的自己部落的敌人，更仇恨满族统治者。一旦这种仇恨加深，并且超过部落界限联合起来，就哪怕是两个部落联合起来，那就苦了满族统治者，满族政权就可以永远被推翻了。

在伊犁河谷较集中居住的古代居民是西蒙古或者称为卡尔梅克的民族。清朝乾隆皇帝推翻卡尔梅克汗王之后，大部分臣民被挤到了西部地区和西北地区。只是 20 年之后，部分卡尔梅克人才重新回到自己的故乡。然而到这时，中国政府已经统治了伊犁河谷的部分地区，所以没有让蒙古人留在伊犁河谷，而是派他们去驻守边境山区。当天我们就在此地碰到了他们。他们的驻地对伊犁河谷形成了半圆形。根据向我提供的材料，在边境地区游牧的纳贡卡尔梅克人的总数约为 18000—19000 户，他们分为 40 个苏木勒，每个苏木勒有 400—500 户人家。这 40 个苏木勒的大致分布情况如下：

1、居住在南山边区的有：

- (1) 杜尔干（六个）苏木勒驻守在特克斯河上游地区，
- (2) 阿尔班（十个）苏木勒驻守在特克斯河下游地区，
- (3) 多尔布（四个）苏木勒驻守在托克斯土拉以东以南地区；

2、居住在北山边区的有：

从鄂则克到喀什的霍鲁木（二十个）苏木勒。

除上述四十个苏木勒以外，还有很多卡尔梅克人居住在东部和东北地区，他们被称为察哈尔⁽⁶⁾蒙古。

卡尔梅克人的生活习惯与哈萨克人无多少区别，卡尔梅克和哈萨克都是游牧民族，主要从事畜牧业。他们都住毡房，并根据不同季节更换住地，也就是夏天在山上过，冬天逐渐迁移到平地。卡尔梅克人牧放的牲畜数量和哈萨克人的差不多，只是他们的马匹数目比哈萨克少许多。他们从事农业的人要比哈萨克人少，不过居住在尼勒克河（今喀什河）流域的数百名卡尔梅克人除外，这里的卡尔梅克人完全和当地的塔塔尔农民杂居在一起，并全部从事农业。1862年我本人也没见几个卡尔梅克人，只拜访了两顶毡房。这些毡房大体与哈萨克人的相同，但要比哈萨克人的不卫生，卡尔梅克人自己同样也比哈萨克人脏，而且衣着也很破烂。

卡尔梅克人都信奉佛教。在伊犁地区，他们最崇高的圣人是“山木巴喇嘛”，每年的4—9月份他们在特克斯寺庙中传教。卡尔梅克人的第二大佛寺在伊犁河右岸，固尔扎城的塔塔尔人和汉族人居住区之间。这个寺庙是山木巴喇嘛冬季—9月至来年4月的住地。一到冬季，和山木巴喇嘛一起到固尔扎地区的人约有200多名，他们大部分都是年轻神职人员，这种神职人员在卡尔梅克人中一般都比较多。这些年轻人在这里学写字和念书。根据我所掌握的材料，在卡尔梅克人中有文化的人比较普遍。

清朝大将军每年参加一年一度的伊犁佛寺的祭奠活动，将军亲临代表着皇帝，所以他的出现伴有许多隆重的仪式。冬季，伊犁的寺庙一般都显得很热闹，在这个季节，这些人流中，有虔诚的卡尔梅克人、朝觐者队伍、还有众多的汉族商贾。这些商人在寺庙周围摆设自己的摊点，使其形成为一个小小商城。寺庙的三个殿堂前有一个前院，一天两次的宗教进餐就在这里举行。每次进餐都要宰杀五头牛和十只羊。

卡尔梅克人的内部管理权掌握在部落头目—宰桑和低职官员手中。这些官员帽子上都有由清朝政府授予的表示职位的顶珠。部落最高头目甚至还可以获得将军的职位，也就可以戴红顶珠帽，然而这些卡尔梅克官员统一服从于清朝将军—梅音安班（领队大臣）。梅音安班一方面是清朝政府和卡尔梅克人之间的中介人，也就是说，他将清朝将军的指令下达给卡尔梅克官员，又将他们的意愿上报将军。另一方面，梅音安班的任务是时刻监视卡尔梅克官员和在群众中发生的一切事件，以协助政府防止发生任何独立和违法事件。为完成这些任务，给梅音安班调派了为数不多的清兵，他们就散住在卡尔梅克人中间。卡尔梅克官员一方面要协调臣民和自己内部的各种矛盾，并维持内部安定和秩序；另一方面，还要催促按期纳税，并模范完成清中央政府所规定的各项义务。卡尔梅克人应完成的各项税收和义务如下：

- 1、纳税：伊犁地区的农民和军垦缴纳的税额为2000头牛和500匹马。
- 2、人头义务是：(1) 向固尔扎城运送自山上开采的铜和铝矿石；(2) 提供边境哨所需要的足够数量的兵员；(3) 一旦爆发战争，每个苏木勒出兵1000人；(4) 战争期间提供军食。

士兵在战争和驻防卡伦期间，每月薪金为半盎司（约4个半马克）白银，但是政府早已不发放这笔钱了。卡伦兵每月换防一次。卡尔梅克人虽然过去对汉人比对哈萨克人更敌对，但现在由于宗教信仰、生活习俗关系，他们比起哈萨克人，对政府反倒更接近。卡尔梅克人对满洲人虽然不是特别友好，但总的来说他们的关系并不是敌对的。清朝当局之所以能够赢得这种局面，是因为他们对地方政权给予了完全自由，根本不干预（顺便提一下，他们之所以这样，并不是政治上的宽容和仁慈，而是他们见不得一切外国和外来的东西）卡尔梅克人的内部事务和习俗信仰。除此之外，让卡尔梅克人出兵来保卫国家安全的事实，也唤起他们臣服于中央帝国的意念，在暴乱中卡尔梅克人不会叛变于政府，在这同时也不会为了保护它而牺牲自己的切身利益。

伊犁河谷真正的穆斯林游牧民族—吉尔吉斯⁽⁷⁾和布鲁特（喀拉吉尔吉斯⁽⁸⁾）的人数并不是很多，属于哈萨克部落的只是在伊犁河谷西北地区过冬的大玉兹的极少部分人。主要是苏万

部落的部分阿乌勒和阿尔古部落的个别帐户。哈萨克大玉兹占用中国地方，中国政府也至今认为苏万部落是自己的臣民，所以他们向政府交纳 40 匹马。索伦人和苏万部落的关系很密切，相互进行频繁的贸易，雇用他们为其放牧，这的确是一种哈萨克人偷盗牲畜的最有效的办法。布鲁特（喀拉吉尔吉斯）人从来不去伊犁河谷地区，他们只是以卡尔梅克人为邻，居住在特克斯南部边境山区。只有布吉部落的很少一部分人至今还没有向俄国臣服。中国政府至今也认为，布吉部落是自己的臣民，并向其征税。

我们如果现在开始述说伊犁河谷的定居种地人口，那么我们便会发现在这里的各个城镇，甚至是小居民点都有定居的塔塔尔（文中的塔塔尔指的均为维吾尔族—汉译者）农民；他们自称亚尔勒克（当地主人），但是其他邻近民族都用蒙古语的塔兰奇，也就是种地人⁽⁹⁾来称谓他们。如上所述，在蒙古统治时期，将喀什噶尔的俘虏送到了伊犁河谷。清人占领伊犁地区之后，也效法卡尔梅克人，在这里设置了许许多多从六城⁽¹⁰⁾来的塔塔尔人村庄。从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吐鲁番、阿克苏和乌什迁到伊犁的塔塔尔人总共有 6000 户⁽¹¹⁾，现在已经发展到 8000 户。迁移这些塔塔尔人的原因有两个：一是遣散塔塔尔居民区的危险人物，以此来摧垮他们的反抗；二是这些新移民可以在伊犁河谷种地，而以他们每年的纳税可以作为军粮。如果这些军粮从内地运来，花费会很高。给每户农民分种 12 俄亩地，作为耕地的代价，户主每年向政府上交公粮 32 升（中国的计量单位）谷物，也就是小麦、大麦、稻米、谷子各 8 升。

这种谷物实物税相当于 8—9 银卢布，这样以来，根据伊犁地区很高的货币价值，其总价超过了两倍多。

这 6000 户塔塔尔人在伊犁地区的分布情况如下：

1、伊犁河右岸地区：

（1）喀什河地区 500 户；（2）阿尔斯坦渠流域 600 户；（3）拜士开渠流域 520 户；（4）尼勒克河流域 400 户；（5）鄂拉台河流域 620 户；（6）博罗布尔嘎孙、毕列开和楚布尔开河流域 500 户；（7）吉尔嘎兰河流域 1000 户。总计 4100 户。

2、伊犁河左岸地区：

（1）塔尔斯地区 100 户；（2）科古斯地区 200 户；（3）扎格斯台地区 200 户；（4）海努克地区 200 户；（5）布戈拉地区 200 户；（6）霍诺海地区 400 户；（7）多拉特、嘎尔扎特和达达木图地区 600 户。总共 1960 户。

按 6000 户计，塔塔尔农民每年得上交实物税 192000 斗谷物，1834 年他们的在册人口增加到 8000 户，那得上交 256000 斗，也就是上交二百万卢布。尽管赋税很沉重，但我的信息提供人一再向我解释，1826 年喀什噶尔暴动⁽¹²⁾以前，这里塔塔尔人的生活是相当不错的。他们都能够按时纳税，也饲养许多牲畜。我的信息提供人以特别赞许的口气述说了在此之前中国政府对他们的同情与关怀，遇不幸事件和歉收时，政府减少农民的赋税并提供资金，以此关心他们的生活。但是，自六城区暴乱发生以来，伊犁地区，尤其是塔塔尔农民遭受了巨大灾难。

六城战事暴发时，伊犁地区的塔兰奇人不仅要被迫提供成倍的军粮，而且还要将其用私畜运送到作战区。这种运输要通过险恶的天山山道，所以花费也很大。到了战争的第二年，塔塔尔人的生活降到了极贫线，而且这一年的冬天很长，又特别寒冷。他们告诉我，几百个塔兰奇人冻死在去喀什噶尔的路上，无数役畜倒毙在半路，而活下来的又被贫困不堪的士兵抢走。固尔扎城内甚至不是中国籍的商贾也被迫摊派出运送军粮的役马 500 匹，此后未见返还过一匹。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中国当局最后平定叛乱并建立秩序为止。现在，地方政府要供应成倍的军队，但中央政府根本不拨发资金，所以他们的财政状况十分困难。当局寻找财源的时候，有一位将军提出伊犁地区塔兰奇人的户数已增加到 8000 户，并提出在 1834 年开挖托古斯塔拉水渠，以便从耕种公地的塔兰奇新户征收官税。这条水渠要经过从伊犁河往南方向的多石地段，所以开挖整整花去了两年时间。在这期间，塔兰奇人一直提供了 3000 名无偿劳动力。到后来分配耕地的时候，只给分配 1500 户，而地方政府向北平当局汇报时，却上报为 2000 户。塔塔尔地

方官只好将自己在博罗布尔嘎苏的土地分给塔兰奇人耕种，而自己出资修博罗布尔嘎苏和毕列开新渠。到 1836 年夏，因水渠挖得不够深，托古斯塔拉渠的水不够浇灌新开垦的耕地，其结果，1500 户新移民的庄稼全部枯死，这些不幸的人们不仅未能纳税，自己也遭受了饥饿。这一状况持续了三年。在这期间，其余 6000 户塔兰奇人不仅要替这 1500 户人上交公粮，而且还要为重新修大渠提供 3000 名劳力和救济托古斯塔拉的饥民。

1836 年，霍诺海的塔塔尔农民已开始闹事。一个自称和卓的名叫沙莫西的波斯人，宣扬自己能够从汉人的统治下解放人民大众。灾难的十年使民众贫穷不堪，为了摆脱难以忍受的压榨，他们投靠了假和卓。只要有人违抗和卓，就被除掉。当起义还没有来得及传到其他塔兰奇村落时，中国当局便得到了这一消息，所以他们毫不费力地镇压了这个毫无计划的小小叛乱。波斯人也和其余起义头目一样，被逮捕之后送到固尔扎城，将波斯人当众严刑拷打并将他及其他 16 名从犯的头砍下来，用木桩穿上挂在塔兰奇村庄的交通要道示众警告。近一百人被遣送到了内地，许多村庄都被士兵们抢劫一空。1840 年和 1844 年，在喀什噶尔重新爆发了叛乱。在这些年代，塔兰奇人为运送军需品又遭受了许多灾难。

这些灾难虽然导致了塔兰奇人生活的穷困不堪，但如果不是中国的统治集团，这些人凭自己忘我不懈的劳动，本可以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生活得不错。统治集团不信任群众，欺压他们，对他们无恶不作，逼得他们走投无路。他们设置的塔兰奇官员，个个都是长在群众中的毒瘤。这些塔兰奇官员交错散居在各个塔兰奇村庄，他们盲目地成为当局手中的武器，贪婪自私，只关心自己的利益，使其叛变了自己的民族，变成了异族奴隶，并在民族外衣的掩护下无恶不作。在这方面，满族人行事聪明得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利用人民群众不断遭受地方官员欺压的事实，将民众的仇恨从自己身上引向他们身上。

塔兰奇人的官僚上层人物是固尔扎城的阿奇木及其助手沙葛，阿奇木和沙葛两个人都戴标明他们职位的蓝顶珠官帽，也就是等于上校军官（乌合里达）。阿奇木有时也能被授予红顶珠帽（安班职务），现在的阿奇木就有此官衔。管理所有农牧民、塔塔尔居民的大权都掌握在这两个官员手中，他们两个人只是向将军和其副手负责，而将军又通过他们两个人向全区居民传达自己的指令。一旦讼争和案件跟塔兰奇人有关时，除警察和行政当局之外，他们甚至可以成为上级审判法院的代表。

塔兰奇人分为八个行政管辖区，其中六个归尚伯克和米拉布伯克管；两个归列斯尼奇和米拉布伯克管，其中前六个管区是：

- 1、吉尔尕浪；
- 2、博罗布尔嘎苏、楚布尔开、毕列开；
- 3、尼勒克和鄂拉斯台；
- 4、哈什以远；
- 5、布戈拉、海努克、扎格斯台、科古苏；
- 6、达达木图、多拉特、霍诺海。

后两个管区是：

- 1、托古斯塔拉；
- 2、阿里鄂斯腾。

列斯尼奇和尚伯克的帽子上都有标明他们职位的白色顶珠（哲尔基章京等于大尉官衔）；米拉伯克同样也戴相应的职位标志顶珠的帽子。有时蓝顶珠也会被奖授给列斯尼奇。

每个这样的行政管区又分为两个部分，并且每个部分又归明伯克（千户长）管辖。明伯克戴的是铜顶珠帽。每百户农民设有玉孜伯克（百户长）和鄂列戈巴什（五十户长）。十二个大玉孜伯克也都戴铜顶珠帽。最后是每十户的头人温巴什（十户长）。这样以来，整个官僚机构的设置情况是：1 名阿奇木，1 名沙葛，2 名列斯尼奇，6 名尚伯克，8 名米拉布伯克，16 名明伯克，80 名玉孜伯克，80 名鄂列戈巴什，800 名温巴什，总共 994 名官僚。所有这些官员中，

除了温巴什以外，均由清朝当局批准任命。温巴什由阿奇木自己指定，并根据其意愿来替换。所有这些官员的薪金均由农民来负担，政府已有好几年停发这笔开支。除了他们的薪金以外，农民还得向这些官僚提供佣人。通过阿奇木的协助，不少清朝官员也从塔塔尔人中得到了这样的佣人和劳工。由此可见，农民为地方官僚所支付的开销，很可能超过了应负担的赋税额。

我的一位资料提供人这样说道：“伊犁地区的民众，没有谁家像农民那样担负着沉重的赋税，并且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当我们向长官述说自己的苦处时，得不到他们的丝毫帮助。他们每个人都是满族官员或者是塔塔尔官员，会抢走他们看中的一切。这几年我们连卡尔梅克人的牲畜都很难得到，地方官员同朝廷的官员一起把牲畜都吃光了。”

除上述塔兰奇以外，属伊犁地区塔塔尔人的还有固尔扎城的居民，或者称其为当地塔塔尔人。如我已述，固尔扎城早在汉人统治尚未延伸到此地之前就已建成。这里的大部分居民是伊犁河谷当地的土著民族塔塔尔人（过去在伊犁河谷生活的只有塔塔尔人，他们均说察合台语，见《巴布尔纳木》页 2⁽¹³⁾）。除塔塔尔人外，其次就是从六城遣送来的流放人员和来自喀什噶尔、浩罕、塔什干及布哈拉的商人。他们多年来在这里经商，已成了中国籍的臣民。我不能提供他们的准确人口数字，看来起码有 80000 人。固尔扎城位于皮尔沁河流入伊犁河汇合处不远，这是一个四周由土墙围起来呈四方形的城市，有四个大城门，城市街道均呈直线，而且大都是直角交叉路。

虽然全城大权均掌握在阿奇木和沙葛手中，但塔兰奇人仍有自己的管理体系、自己的长官、自己的管理机构和自己的纳税制度。向我列举的职官中有：卡孜和伊什卡尔（法官）、帕什塔甫（监狱长）、萨达里和明伯克（警察局长和警备司令）。城市居民交纳的一部分是土地税，另一部分是营业税。这种纳税办法同中国的其他城市相同。经清政府官员的同意，阿奇木有权将违法的塔塔尔城市居民遣送到农村。

固尔扎市民的生活远不像农村塔兰奇人那么穷困艰难，而且都集中居住。这些人都接触了文化，他们中已有了资本家、商人和宗教人士，而且他们的势力越来越大，在自己不同意的情况下，能够与长官对抗和拒绝其要求。在那种现实条件下，他们能够保持自己独立自主的立场。

近十年来的历史可以证明，市民们反抗当局无理要求的无数实例，如第一次喀什噶尔起义时，固尔扎市民捐马 500 匹，当再次让他们出同样数量的马时，他们都拒绝了。所以等起义被平定后，不少浩罕商人被驱逐出境，而对本地中国臣民未敢采取任何措施。1862 年当局为考察伊塞克湖，要求农民出资 8000 卢布时，城市公众同样拒绝了其中 5000 卢布的摊派。

虽然城市居民的构成、管理方法等与塔兰奇农村有很大区别，但固尔扎仍然还是伊犁地区全部塔塔尔居民的中心和核心。城乡之间的交通本身将这个城市变为了这种核心。所有从塔塔尔中亚（布哈拉、浩罕、阿尔特沙尔）运往伊犁河谷的货物，均通过固尔扎城在城乡居民之间进行再分配。这里既是农民销售自己谷物的市场，也是购得自己必需物的市场。固尔扎城的塔塔尔人以手工业发达著称，但最终牢固联系固尔扎城和塔兰奇农村，以及使其成为整个伊犁地区塔塔尔民众中心的是他们共同的宗教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对和异教徒在一起生活，并处于其压迫之下的塔塔尔人更能深入他们的心灵。民众本能地意识到，唯有对宗教的笃信与虔诚以及毫无条件地完成各项教规义务，才能免受其异族统治的恶劣挑拨影响。如果穆斯林群众被迫成为统治者对厌恶至极的佛教神像的敬拜及念经活动的见证人的时候，那么他们的宗教信念该会有多么强烈呢？何况他们还得屈服于那些把猪肉当主食的人的统治。

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和统治当局的官僚机构平行出现了伊斯兰教十分松散的本民族管理体系。这一体系主要依靠民众的宗教情感来维持，以使其不受周围居民的有害影响。固尔扎城是这个宗教阶层的中心，其上层也都在这里。

哪怕是最小的塔兰奇村落都有两个宗教人士—一个是伊玛木，另一个是教师（毛拉），而且到处都有宗教学校和清真寺。宗教人员负责督促每个社会成员遵守教规。只要出现对教规的

不忠或违反行为，他们都要向其上一级阿訇报告，阿訇又通过阿奇木惩办违反者。到夏天，毛拉没多少事，宗教学校只是在冬季上课，但每天都得上，而且整天整天地，只是节假日除外。让不让自己的孩子上学是个人自愿，有个别家长不让孩子去上这类学校，毛拉可以从每个孩子身上获取一定的薪金，所以宗教职员总是以劝说或者强迫的手段达到使每个家庭起码有一个孩子去上学。大多数这种学校只教念书，即从吟诵阿拉伯语的赫夫提亚克⁽¹⁴⁾和古兰经开始。孩子们一直念到背会为止，等学生们机械地背会阿拉伯语经文之后，再用塔塔尔语给他们解释伊斯兰教教条与教规的含意。只给一小部分人教文字，并且毛拉为此另收教授费。尽管有30%—40%的人会念字，但会写者只有10%。宗教员工和教师都有薪金。

固尔扎城的大多数伊玛木和毛拉也同农村的宗教界人士一样，也都是本地人，并且都是在本地受教育的。在这里不存在什么公共教育，毛拉一般都是在自家个别教授学生，学生的人数不等，男女不同年龄的学生均在一起听讲。这种教学也要持续整天，每个学生每月向毛拉支付不等数额的学费。毛拉收取学费的标准取决于他的威望与威信。初教的月平均费用为一个萨尔铜板（80—90戈比）。有钱人也在自己家中给孩子另请老师。有学识的毛拉招收终生献身于伊斯兰教的高年级学生。

固尔扎城的有些小清真寺里，除伊玛木外，还有宗教最高法庭的宗教上层学者阿訇。这些阿訇大都在喀什噶尔或者在布哈拉接受过教育，并且都熟练地掌握阿拉伯和波斯语。清真寺的阿訇都是这一地区真正懂法的学者，他们不服从任何地方长官。当局虽然根本不支持阿訇，但是民众的宗教信仰给予他们无比力量。不仅是塔塔尔官员听从他们，而且因为他们能够轻易燃起民众的宗教狂热之火，所以清朝官员也惧怕他们。下面这一事例即能说明此事。

1834年修托古斯塔拉水渠时，塔塔尔人阿奇木哈里萨特，借助于开发新地成了清朝官员的宠儿，并提升为不小的官职。这个阿奇木在清朝将军的庇护下变得狂妄自大，开始排挤自己的同胞，并穿着官服，拒绝遵守伊斯兰教规。他多次拒绝与阿訇会见，以便承认自己的过错。此后阿訇要求将军惩治其过，将军虽然对阿奇木的所作所为持鼓励态度，但他热情接待了阿訇，并同意从塔塔尔高层官员中选派五位法官来调查此事。法庭确认哈里萨特有罪之后，将军让宗教人士自定如何处置。他们表示，根据伊斯兰教的规定，阿奇木应受石击惩罚，但他自己要求从轻处理—解除其一切职务，并遣送到吐鲁番。

所有塔兰奇人都认真遵守宗教教规和仪式，遵守斋戒和念叨经文，只食用伊斯兰教允许的食品，即哈拉木阿什，尤其禁食猪肉。塔兰奇人的这种宗教情绪到了何种程度，从一个人对我的“什么食物最脏”的回答中便可以说明。这个人对我回答：“不洁净食物（哈拉木阿什）有七种：猪肉和古兰经禁食的其他动物肉；盗窃来的食物；从孤儿手中抢来的食物；从委托于你的财物中取得的食物；妻子卖淫获得的食物；偷来的食物；骗来的食物。但是对后六种的惩罚不同于对第一种的惩罚。谁吃了猪肉，他便犯了弥天大罪。”

在伊犁地区，统治民族的宗教对卡尔梅克和达斡尔⁽¹⁵⁾影响很大，但塔塔尔人都很少受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影响，所以他们绝对服从伊斯兰教。经过百余年之后，对整个塔塔尔族来讲，汉族及其文化，如同塔塔尔人迁来初期一样，仍然还是格格不入。只有生活在城镇和乡村汉族区的个别人，才和汉族人接近，即使在这里，对异族文化的接受也是从放荡不羁开始的，所以这些人的名声极坏。阿奇木哈里萨特的例子也可以说明这一点，他爱喝酒，并过着与汉族“半上流社会”有着交往的淫荡生活。

农民生活的村庄都不大，一般一个村庄有10—30户人家，每户相隔很近，布局既无一定方向，也无什么街道可论。这种布局也许一方面意味着对过去突厥人游牧生活的追忆，另一方面毫无疑问可能是取决于浇灌条件。所有塔兰奇人的房屋均由干土坯建造并呈四方型。这些房屋都不高，而且一律平顶。每座房屋有两个部分：卧室和厢房。厢房占整个建筑物的一半，夏天它是全家的聚居处。厢房的一扇门通向旁边有储藏室的伙房，另一扇通向卧室。卧室通常都放有一张圆矮饭桌，沿墙放有置衣物和其他杂物的柜子。地上铺有地毯或毡子。伙房入门的右

边是炉灶，其围墙都用稀泥抹刷。代替烟筒的是屋顶上对着炉灶挖开的顶洞。

房子四周建有其他生活用建筑和牲畜棚圈。

虽然教规准许一夫多妻，但所有农民无一例外地只拥有一个妻子。在固尔扎城里也一样，多妻者很少见，只有个别富有者才有两个妻子。听说在这里只有一个塔塔尔人娶了四个妻子。妇女担负着一家的生活，同样还要照管奶牛、役畜和羊只，而马归男人看管。在庄稼播种期和收割季节里，妇女还要参加田间劳作。

农村居民的饮食很简单：砖茶、羊肉、黑麦面和大麦（糊糊）稀粥、烤饼，还有大米、小米饭。他们种植的果蔬有：苹果、什甫塔拉、桃子、杏子、甜瓜、西瓜和黄瓜。

塔兰奇人的服饰和所有塔塔尔穆斯林人相同。塔兰奇男性上身穿家织亚麻布长领开襟衫，下身穿同一布料的宽裤子，而且是裤腿还要塞进带套鞋的塔塔尔软皮靴中，直到小腿肚。夏季，他们在衬衫上面还要穿一件和衬衫相同式样的由关内粗布缝制的长衫。到冬天，要穿好几层这样的长衫，只是上面一件是棉的而已。有时也穿肥大羊皮或山羊皮皮袄。有钱人家节假日穿浩罕粗丝绸杜里阿长衫。妇女衣着同男性的区别是，她们的上衣和长衫都长一些，而且衬衫均不开襟。

按伊斯兰教习惯，男性在光头上戴小帽，未婚少女梳辫子，已婚妇女头上包头巾，均不蒙脸。妇女节假日穿用金线缝制的布哈拉布料吉木哈巴的衣裙。

这里的妇女，也和各地所有穆斯林妇女一样，处于从属地位。这种地位取决于伊斯兰教教规本身。通常社会对待妇女的态度都很粗鲁。娶妻一般不送彩礼（卡勒木）。如果丈夫将妻子送回娘家的话，双方说亲人另商该向丈人偿还赔偿金的数额。

善良、诚实、勤劳是塔兰奇人的基本性格特征。他们的这些特点甚至从大多数人的脸上便能看出。但是，长年的压迫和穷困使他们变得有些压抑、胆怯和疑心重重。虽然如此，任何东西都无法泯灭他们的意志，在他们的心中仍然燃烧着对压迫者仇恨的火焰。他们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过着极其痛苦、穷困、郁郁不乐及难堪无味的生活。也正是这些，同时也炼就了这个小小民族的精神。塔兰奇人的勤奋和耐劳使人敬佩不已，农业劳动是塔兰奇人唯一的谋生之路。这就要求他们付出双倍的劳动，他们不仅要用原始工具经营农田，而且还要在每块地里修2—3英尺深的水渠，然后将这些浇灌水渠与大渠或河流连接起来，并经常整修以保证正常使用。这样的整修劳动一年要进行好几次，因为急流很容易冲垮这些渠沟。

伊犁河谷的农作物价格非常低，付出繁重的劳动而收获却很少，所以塔兰奇人常常被迫送自己的孩子到其他城镇去争钱。伊犁地区各城镇塔塔尔工人和手工业者不少。他们大多数都从事那些需要付出较强劳力的工种和行业，因为力气不大而且大部分瘦弱的汉族人都愿意让位于他们。大多数塔兰奇人都是铁匠、木匠、伐木工、运输工等等。种地塔兰奇人很少经商。经商的几乎一律是固尔扎城的本地人和六城来的移民。

由于实际生活条件，在塔兰奇语言中产生众多特殊成分是非常自然的现象。宗教和由于宗教影响所出现的书面语，同时也和布哈拉书面语接近，并注入了许多波斯和阿拉伯语词汇。卡尔梅克人、达斡尔人和汉族同样也大大地丰富了塔兰奇人的语言词汇。其中起最大作用的是汉语。汉语不仅为塔兰奇语注入了与汉文化有联系的大量技术术语和词汇，而且也注入了与行政管理、司法诉讼和政治生活有关的词汇。虽然这种大量词汇的借入，使塔兰奇语发生了十分明显的变化，然而突厥语本身却被纯正地保存了下来。在这里，塔兰奇人的语言十分接近六城地区的语言。所以我认为，这种语言完全可以被认为是总体上属于中亚语言的维吾尔语族，而且可以毫无争辩地把来源于六城地区的塔兰奇人和塔塔尔人视为古代维吾尔人的后裔。中国人至今将上述塔塔尔人称为“回子”，以此来严格区别称为“缠头”（恰尔玛）的中亚塔塔尔人（浩罕人、塔什干人和布哈拉人）。如果有时将部分中国人也称为“缠头”，那只是为了说明这些人是中国的穆斯林。中国西部地区的穆斯林人，即在固尔扎称为“东干”的民族，汉语则称为“回回”，以此来说明他们和维吾尔人同属于“回子”部族。维吾尔人同时享有两种族称，在中国

史书中早有记载：“最初回鹘，直至唐朝中期的元和年间（也就是 806 和 820 年间）改名回鹘之前，通常称为回回。在中国蒙古统治时期称其为维古尔。”固尔扎城的塔兰奇居民均操伊犁方言。在农村，由于每一个村庄的人都是集体从六城的某一地区统一迁来，所以他们的语言特点保留时间也较长。现在仍有部分地方的人讲喀什噶尔方言，有的地方人讲吐鲁番方言。

在塔兰奇人中间，以民歌和民间故事⁽¹⁶⁾形式存在的文化色彩较明显。风格独特的民歌，说明了贫穷和欺压未能完全压垮他们，也未能剥夺他们的精神力量，作为这种诗歌的例证，我在下面引举一首短歌，并用它结束我对塔兰奇人的概述。这是一首不识字的塔兰奇歌手唱的歌，如下便是其几乎一字不差的译文：

你的双眉黛如黑海狸毛！
我该是黑夜里或是白天里来？
如果是黑夜里来四周将静悄无声，
如果是白天里来众人会恶语四扬。

姑娘，你就在我心中，
你在燃烧我的心房，姑娘，
我爱你的眉毛，姑娘—苏莱曼⁽¹⁷⁾，
姑娘，我也爱你的黑发飞扬。

我在园中播种小麦，
麦子已经长到齐腰高，
我们才刚刚相识，
老天便将我们拆散各方。

根根茜草搓在一起，
成了捆麦子的草绳；
谁要是刚坠入情网，
他就会像公狼般发狂。

一旦天上黑风四起，
鲜花就会纷纷凋落随风飘扬，
花枝折断就会失去青春，
泯灭一切的命运就会来到世上。

啊，失去了心上人的日子，
会漫长如夜只盼明天！
处在恶如地狱般的境况，
正是爱情燃烧在心中的时刻。

如果今天站在你面前的是另一人，
他明天便会把你忘在脑后，
但好人会永远牢记，
他曾经吻过的心上之人。

你的眉毛在闪闪发光，

你的长辫披在了腰间，
你可不要再走出自己的房门，
不然会引出情敌相互殴伤。

情人的心好像是一只雄鹰，
我对他好比是一只被猎的鹅，
我的双眉是他的诱饵，
我的胸怀是召唤他的猎鼓。

只有熟悉中亚鹰猎习俗的人，才能理解这首歌的最后一段。等猎人发现野鹅时，会拿下手上猎鹰头上戴的眼罩，这时它就会冲上天死死盯住猎物，要想召回未逮住野鹅的猎鹰，主人会击打挂在右肩的猎鼓，并用手上的肉块来诱惑其归来。这样猎鹰就会返回栖落到主人的左手，得到诱食。

18世纪中叶，中国政府为了保卫伊犁河谷，调遣达斡尔族到这里，他们是属于通古斯部的锡伯和索伦两个部族。这两个部族连同其眷属由政府迁来，并且一来便得到了非常肥沃的耕地。后来索伦人驻地在伊犁河的右岸，在图尔根和霍尔果斯河之间，而前者的驻地则在塔塔尔城固尔扎对面，在伊犁河的左岸。他们的军垦地不纳税，然而男性均要服役，而且在战时还要被征调。所有这些移民都分布在十四个营区—苏木勒中。其中在六个苏木勒驻索伦人，在八个苏木勒中驻锡伯人。在本世纪，又组建两个新的锡伯人苏木勒归辖于索伦营，于是现在便有了八个锡伯苏木勒和八个索伦苏木勒。每个苏木勒分得500户人家耕种的土地，这样算下来达斡尔人的总户数约为8000个，也就是他们的数量也和塔兰奇人相等。因为每户分得相当亩数的耕地，所以每户可能有三个习武的男性。根据向我提供资料人的数据，在战时，达斡尔人可以出兵20000—25000人，我认为这是一个被夸大了的数字，因为任何一个民族，大概不可能动员总人数的1/3男性。锡伯和索伦人从19岁开始服役，并在本村由当地长官教练武术。在和平时期，真正服役的人数连一千人都不到，而且每村轮流派人。到南疆去服兵役，期限为两年，在伊犁地区边界哨所服役的，只有一个月。军队征兵要求不一定是本人，而可以雇他人去替代，在和平时期基本上是雇来的人服役。所以看守边防哨所的都是些不能在田间劳动的老弱或游手好闲之徒，他们的形象极易引起过境人员的厌恶和怜悯。因为财政状况不好，政府早已停发了守卡士兵每月3个卢布的薪金，所以大家都尽量派去家里不能劳动的成员，或者低价雇人代替自己。低价能雇到的往往是那种懒汉，他们把争来的钱喝酒花完后，就在那里熬日子，只要不饿死就行。我亲自曾在哨卡见到过这样的锡伯和索伦人。这些人，因营养不良和吸食大烟，被折磨得惨不忍睹，他们实际上是一群乞丐，而不是什么边防卫士。

上级长官对边务和军事的这种忽视态度，从一方面分析，可能巩固了戍民的经济地位，但是完全泯灭了军气，使其在危急时刻不能有力地为政府效劳。锡伯、索伦两营同属满族安班管辖，达斡尔军官和官吏也归其管辖。如果某一达斡尔官员被授予为将军（红珠顶戴），他就会享受和满族官员相等的待遇和职务。

锡伯和索伦都一样，他们脸型的特点特别明显。他们个儿不大，而且也不是很壮实。他们向汉人学会了吸大烟，所以看上去大部分人都有病。他们的男装像中国的军服：上身是棉白布长衫，下身是同样面料的过膝盖蓝长裤；还有就是穿在长袍或短衫上面的坎肩；脚上穿的是中式棉布鞋或齐膝盖的靴子；头戴中式绒宽边带红珠瓜皮帽。夏天劳动时身着短衫，头戴草帽。锡伯、索伦人也和汉族一样，刮鬚而留胡子。我看到的只是在田间劳作的妇女，她们上穿长蓝布衫，头戴草帽。达斡尔人也和满族和大多数汉族一样，信奉佛教和儒家学说。

锡伯语完全和文学满语相同，也就是说，锡伯语就是满族书面语，而他们的口语不完全一样。但是说的不完全和他们说的一样，锡伯语的话（gisun）一词说出来和写的完全一样，但是满文虽然写成为gisun，发音时却为jisun。由此看来，锡伯族很可能也和15世纪入关的满

族一样，同属一个部族。到现在，没有文化的满族人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语言，只会讲汉语，而有文化的满族却把满文当外文来学习。因为满文是办公用的官方语言，所以在满族长官办公室当书记员的一律是锡伯族。为满族长官当书记员的待遇相当丰厚，所以几乎所有锡伯人都在学习满文。索伦人的情况有所不同，有些人会操纯通古斯语，另一部分人说话，很明显夹杂着大量蒙古语，这些现象从我记录的索伦语词汇中也能看出来。

锡伯和索伦族的性格大都傲慢和自大的同时，都非常暴躁和不能自制。作为皇帝的卫士和统治民族的近亲，他们都自认为比塔塔尔和汉族高贵。汉人并不害怕这些人，且常常用骂人的话“外国人”（强盗）相称，以此制造长期矛盾。锡伯和索伦族也和塔兰奇人一样，主要从事农业。除此之外，他们还具有大群牲畜，夏天他们把畜群交给哈萨克人牧放。他们饲养的家畜有羊和马。

我到固尔扎城，只准许沿着有限的地界活动，所以很可惜未能去南部的索伦村庄去看看。这些村庄，我的采访人称为城市乡镇，就这一点足以说明，可能它们跟塔兰奇人的农村不同，他告诉我这种乡镇中最大的两个是：阿克肯特（白城）和亚尔肯特（沿岸城）。从我的旅行日记中可以看出，沿途我只经过了一个位于第二和第三边卡之间的索伦农田。在相当大的一片农田中央，建有几个收获季节住人的整齐草棚和两顶帐篷。在这里，除索伦人外，我还看到了三个塔兰奇农工。离帐篷不远的地方，露天堆放着三大堆庄稼，这个季节（7月）不怕天下雨，庄稼垛上不必掩盖什么。每堆庄稼垛的周围把地压平后修为圆形打谷场，打谷用的是大石磙。这种大磙约长2俄尺，直径6—8俄寸，被磨成为八角形，并在纵轴钻出孔，中间的轴孔插有约长5英尺的木把。石磙两边伸出来的木把上系有绳子—这便是马拉石磙的绳子。八角磙拉动以后就会绕着轴转动，并以其重量将庄稼穗的谷粒在场上滚落成薄薄的一层。

在这里，我看到的其他农具有镰刀、短把大镰刀。后者的把柄约长1俄尺。大镰刀的刃宽约一俄寸半，大尖头，弯度不大，几乎是直角连在把柄上。也看到过几架耕犁，制作非常粗糙和简单。在长长的木棍顶段钉有横杆，两匹役畜就套在这上面，木棍的下段按有犁铧，离犁铧几英寸高的地方，在木棍上钉有控制耕犁往上翘幅度的木块。

我们到达这里的时候，只收割完小麦和大麦，水稻还没开镰。我听说的索伦人食用的只有小麦，大麦当马饲料用。这里的人不种燕麦。我有机会看到了这里的人工草场。这种草场同样用人工浇灌。人工草场种植的是汉语所称的苜蓿，塔塔尔语比达（指紫苜蓿）的植物，也就是所谓的中国苜蓿。这种植物长着剑型叶子，开淡紫色花。比达长得很快，一个夏天可以割3—4次，并且每次能长一俄尺高。这是一种多年生植物，一次种植后可以生长8—10年。比起其他饲料，马最喜欢吃比达，而且其收益很大，用苜蓿饲养的马，即使不喂谷类，也同样能经得起繁重的劳动。

因为索伦人主要种植谷类作物，锡伯人不得不基本上种植烟草和棉花。这种烟草在伊犁地区以及在哈萨克中都很有名，听说其味浓厚，而且很香。很有可能，收获后锡伯人把烟草浸泡在什么试剂之中。他们的棉花远不如中亚，也只当棉絮用。然而，在伊犁地区可以种植棉花，这一事实就够有意思了。

注解：

(1) 索伦族是鄂温克族中的通古斯语组的亚民族。根据1986年访问过中国索伦族的芬兰学者玉赫·延胡会内教授的口头讲述，有两部分索伦人居住在中国北部地区：一部分住在内蒙古呼伦贝尔海拉尔市；另一部分住在黑龙江省的齐齐哈尔市。索伦人深受满族、蒙古族，尤其达斡尔族的影响，并且一部分又被他们同化，主要从事农业、畜牧业和狩猎。他们至今在呼伦贝尔盟鄂温克族自治旗在汉族、蒙古族、布里亚特族（鄂伦春族）各民族聚居的环境中仍保持着自己的民族特点和语言。根据访问过索伦人的Г.拉木斯铁特所提供的材料，20世纪初索伦人只有约100人。中国史料记载，索伦人13世纪居住在东北地区。18—19世纪初，清朝将部分索伦人作为军事力量迁移到斜米列契地区，边屯垦边戍边。

(2) 跟中国以后标界时博罗胡吉尔哨所(现市)划入俄国版图。

(3) 博什库是主管征税,执行治安措施的下级官员。

(4) 清朝中国男性臣民,其中包括哈萨克族、图瓦族和其他民族,都将头发扎成辫子。我曾在20世纪50年代还有机会看到了上岁数、头发都斑白的图瓦人扎有辫子。

(5) 安班是清朝行政高级长官之一,相当于军队的将军。

(6) 察哈尔(查哈尔)是一个操蒙古语的部落之一,其后裔今居住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察哈尔艾玛克。

(7) 拉德罗夫在本著作(《西伯利亚日记》—汉译者注)中往往把哈萨克称为吉尔吉斯。虽然他也说他们的正确称谓应该他们自称的哈萨克。这种错误的称谓来源于革命前文献中的普遍提法。有时也称他们为哈萨克—吉尔吉斯、吉尔吉斯—开萨克、吉尔吉斯—哈萨克,但这并不是因为起码15世纪已存在的民族没有自己哈萨克称谓的原故。早在16—18世纪俄国史料中已开始出现哈萨克,而且还在19世纪初,A·列夫申在自己的《论吉尔吉斯—哈萨克族的名称》文中就曾提及过。他这样写道,“除俄罗斯人以外,既是他们自己或其邻居民族,谁也不会用吉尔吉斯—开萨克这个民族的名称来称呼自己……吉尔吉斯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民族……吉尔吉斯—开萨克从成立的初期就叫哈萨克……他们没有别的称谓。波斯人、布哈拉人、希瓦人和亚洲的其他民族都知道他们的这个名称。”(A·列夫申《论吉尔吉斯—哈萨克族名及其与真吉尔吉斯或迪克吉尔吉斯的区别》莫斯科通报,1827年,4卷14期,页432—433)根据研究人员分析,将自己的族名改为另一种称谓,是想争取把这个民族同官方文献中的西伯利亚邻近地区的俄罗斯哥萨克区别开来。对哈萨克族错误的称谓一直延续到了十月革命和中亚民族划分时期。1925年,在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把当时称为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哈萨克民族自治,改成了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与此同时,哈萨克族的正确族名正式恢复。1936年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被命名为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8) 拉德罗夫将中亚吉尔吉斯称为喀拉吉尔吉斯。在革命前的文献中,虽然吉尔吉斯的族名很早以前就存在,但是这种称谓同迪克吉尔吉斯、黑吉尔吉斯、布鲁特等是一起广泛运用。对吉尔吉斯的这种不正确称谓,之所以应用于文献中,是想跟上面提到的把他们错误地称为吉尔吉斯的哈萨克族相区分。

(9) 塔兰奇—其准确译意为“种地人”,是18世纪清朝政府从喀什噶尔调迁到伊犁地区移民的称谓。十月革命后新疆塔兰奇人和居住在费尔干纳地区的维吾尔族一起,溶为一个统一的维吾尔族。(关于塔兰奇一词可参见巴尔托里德:《土耳其—蒙古族历史》;《巴尔托里德文集》第五卷,莫斯科,1966年,页288;同著《突厥族》)。

(10) 六城(阿尔特夏尔、阿尔特什尔),新疆部分地区的称谓,包括库车、阿克苏、乌什(乌奇吐鲁番)、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这种称谓最初可能出现于18世纪(见巴尔托里德:《六城》;《巴尔托里德文集》卷3,莫斯科1965年,页318)。

(11) 指塔兰奇人的迁移以及在这个地区新的维吾尔民族群体形成的开始,中亚地区的维吾尔族集聚群的形成,一系列研究资料认为与1758年—1759年清朝政府统治新疆和大批维吾尔民族由南疆迁移到伊犁河谷的历史事件有关。当时部分维吾尔族逃难到了浩罕王国。大批维吾尔族逃到了中亚地区,尤其与在新疆发生的一系列(1816年,1826—1828年,1830年,1847年,1857,1864年)反汉起义有关。1871年俄国占领伊犁地区,而当1881年伊犁重归中国后,留下生活在归俄国管辖的部分中亚地区,称为塔兰奇的维吾尔族人已经很少了。恐于中方的追捕或因耕地不足,从喀什噶尔迁移到费尔干纳的维吾尔族人被称为喀什噶尔人。20世纪初中亚地区的维吾尔族人口为300000余人。今日苏联维吾尔族的民族文化发展事业取得了很大成就(见T.M.伊斯哈科夫著:《中亚地区维吾尔民族的形成》,第三届全苏突厥学术会议论文集,文学与历史,塔什干1980年)。

(12) 1826—1828年喀什噶尔民众反对清朝统治的起义。

(13) 拉德罗夫可能是引《巴布尔传》为证明，费尔干纳安集延城的人讲的突厥语是乌孜别克文学奠基人阿列什尔·纳瓦依所说的文学语言—察合台语。此时，巴布尔列举的还有中亚地区的其他城镇，其中有伊犁河流域的阿尔玛图（现今的阿拉木图）。以下是《巴布尔传》中的例证：“安集延城的居民全都是突厥人，全城大街小巷没有一个人是不懂突厥语的，他们所讲的语言类似于米尔·阿列什尔·纳瓦依……著述的那种文学语言”（《巴布尔传》M·A·萨尔叶译，塔什干，1958年，页12）。

(14) 赫夫提亚克是古兰经最后部分第七章的名称，单独成书。

(15) 达斡尔（达呼尔）是17世纪中叶生活在鄂尔浑河和则依河流域阿木尔河上游的民族。18世纪中叶，部分达斡尔族被清朝政府迁移后，至今主要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北部地区。达斡尔的族属问题已成为过去的争论；其语言为蒙古语组，信奉萨满教。

(16) 维吾尔族在苏维埃中亚地区成功地发展了自己的民族文学艺术。苏联维吾尔族中有大批从事艺术创作的演员、诗人、艺术家。在阿拉木图成立有维吾尔民族戏剧团和维吾尔文出版机构。

(17) 苏莱曼姑娘意为：姑娘仙如索罗蒙（苏莱曼）。

（译自《西伯利亚日记》第九章，莫斯科，1989年）